

人与岁月



岁月如流

我这八十年

祝万安 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人
与
岁
月

岁月如流

我这八十年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岁月如流:我这八十年/祝万安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2
(人与岁月丛书)

ISBN 978-7-02-009487-5

I. ①岁… II. ①祝… III. ①祝万安—自传 IV. ①K825.4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17593 号

责任编辑 徐广琴

责任校对 刘光然
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222 千字

开 本 710×1010 毫米 1/16

印 张 18 插页 2

印 数 1—6000

版 次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9487-5

定 价 30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目 录

前 言 句句是真话	1
-----------	---

第一章 从小学到中学	1
------------	---

一 忠孝世家	1
二 我的父母	6
三 童年往事	11
四 中学时代	17
五 同学年少	25

第二章 从北大到云大	33
------------	----

一 就读北大	33
二 政治民主	41
三 上海度假	49
四 我的女友	55
五 一往情深	61
六 来到昆明	68
七 借读云大	72

第三章 从法官到律师	80
------------	----

一 人民法官	80
--------	----

二	祸从天降	88
三	土地改革	96
四	政治运动	101
五	审判工作	109
六	肃反审干	119
七	律师工作	125
 第四章 从反右到四清		130
一	反右斗争	130
二	三面红旗	134
三	上山办场	142
四	一中教书	151
五	平叛工作	157
六	感情风波	162
七	四清运动	165
 第五章 从“文革”到结束		169
一	“文革”初期	169
二	突然结婚	178
三	两派对立	189
四	我的困惑	193
五	大祸临头	199
六	人生低谷	204
 第六章 从教师到教授		211
一	拨乱反正	211



二	调来云大	216
三	父亲平反	222
四	我的家人	227
五	出版工作	235
 第七章 退休后做律师		240
一	退而不休	240
二	不战而胜	245
三	无罪辩护	248
四	律师职责	253
五	毒品案件	257
六	行政诉讼	263
七	助人为乐	268
八	八十大寿	274

第一章 从小学到中学

一 忠孝世家

抗日战争以前,我只知道自己是四川人,父亲出生在成都,我出生在重庆。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以后,北平、上海、南京、广州先后被日军占领,国民政府迁都重庆,大批“下江人”涌来重庆以后,家父才偶然与同族宗人祝笏山相识,谈到世系流源,才知道祝笏山名撰望,与我祖父祝鹤年(名惠望)是同祖兄弟,也就是说二人的父亲是同胞兄弟。国难时期,兵荒马乱,骨肉之亲,多年失散,偶然相逢,倍感亲切。

当时,我笏山爷爷在国民政府做事,家住重庆市枣子岚垭枣园,家父在重庆东川邮政管理局做事,家住重庆市大阳沟鄢家公馆。一天,笏山爷爷和奶奶,领着他家三个女儿一起来到我家,正式升堂拜祖。我给爷爷奶奶和三位姑姑叩了头。笏山爷爷问我:“三位姑姑哪个最漂亮?”我说:“都漂亮。”笏山爷爷高兴地说:“小小年纪,真会说话。”

后来,笏山爷爷就和父亲一起续修家谱。那是1938年的事。由于年年战乱,亲人失散,信息不通,材料缺乏,调查不易,他们仅将我族“大房子”一支,暂时编印成一本小册子,附以《东园纪略》,供宗人参考改正。从此,我才知道自己家族的源流,找到了自己的“根”。

原来,我祝氏宗人在元朝时候曾是浙江海宁望族,住在海宁州元

化镇。听说海宁就是现在的宁波,但宁波只有袁花镇而没有元化镇,可能是转音或笔误吧。

元朝末年,祝氏始祖真公,曾任浙江省同平章事,至正末年(公元1368年)任统兵,住在金刚台,知道元朝气数已尽,不可能再有作为,就打发他的一个儿子外出避难,自己跟随元顺帝去了北方。后来与明朝大将李文忠大战,终于战败身亡。这事在《纲鉴纪事本末》中有据可查。我有个表叔祝朗轩,又名祝宗彝,曾经过居庸关,看见山上刻有始祖真公亲笔书写的摩岩大字“忠臣至死不变心肠”。表叔的儿子祝鼎彝就托人到该处拓回始祖真迹,不幸在民国二十八年(公元1937年)逃难期间,遗失在湘黔公路途中,虽曾向公路局追索,但由于兵荒马乱,始终无法追回。不知现在居庸关高山之上是否还能找到这几个大字。

始祖真公北上以后,留下一个儿子在南方,辗转迁徙,到了河南固始,入赘赵家,名叫赵公。赵公有两个儿子,第二个儿子叫清公,天性诚笃,小时候就听说他爷爷真公北上以后,与明朝大将李文忠作战殉难,祝氏门下后继无人,多次向父亲请求让他归宗祝姓。赵公说:“这也是我的宿愿,你能胜任,应当由你归宗。”不久以后,赵公去世,葬在邑东青峰岭(西峰庙)。那时清公才十岁,一个人到处奔走,向亲友诉说父亲的宿愿,请求归宗祝姓。然而,赵家族人不愿将西峰庙的田产分给清公,一直不同意归宗。于是,清公只好向官府起诉,请求归宗。由于官府包庇赵家,始终无法解决。后来,正好碰上某御史巡按到该地巡察,清公知道后,独自冲上前去,拦住御史大人乘坐的轿子,喊冤叫屈,痛哭流涕,大声呼号,跪叩不起,直到头破血流,血溅御史衣衫。御史大人被他一片孝心感动,亲自受理此案,清公才得以归宗祝姓。

从此他在固始自立祝氏门户,死后也葬在青峰岭。他的后代支庶繁衍,到明清时期已有祝半城之称。后来,虽然家道中落,而散居四乡及商城、霍邱、立煌等附近州县的,仍不下数千户。



从始祖真公北上,二世祖赵公迁居固始,入赘赵家,三世祖清公归宗祝姓以后,我祝氏门宗代代相传,人口众多,支系分立,历来都是以耕读为主,居家不求闻达。直到九世祖昌公在清顺治己丑年(公元1649年)考中进士,从此科甲联绵不断,尤其是乾隆、嘉庆年间最为兴盛。至嘉庆甲戌年(公元1814年),考入翰林院的进士就达四人,这在当时是很不简单的事。

大家知道,中国封建时期实行科举制度,只有读书才能做官,但要通过严格的考试,否则即使很有学问,也当不了官。你要当官,首先要经过乡试,考上举人,这叫中举;然后要经过会试,考上贡士;最后要经过殿试,上京赶考,由皇帝面试,考上后才能成为进士。不过,举人、贡士、进士只是一种资格,有如一种学术职称,而不是一种官职。取得了这种资格,才有被选拔为相应官员的可能。明清时期,每年从进士中选拔少数几个人入翰林院任学士,负责修史、编著图书、记载皇帝言行起居、进讲经史、草拟有关典礼文书等。由进士选入翰林院叫“点翰林”,唐宋时期相当于皇帝的顾问兼秘书,明清时只是皇帝的备用人才,有条件再放出去当官。

九世祖昌公考上进士后,直接被任命为内阁中书,历任福建兴化府推官、湖广黄州府推官、户部主事、员外郎、刑部郎中、广西按察司佥事、右江巡按、湖广辰沅靖兵备道推升太常寺卿、湖广布政司护理,官至湖北巡抚(相当于现在的省长)。康熙甲寅年(公元1674年)吴三桂叛乱,兵临城下,昌公含着眼泪晓谕军民,奋力抵抗,终因寡不敌众,守城力竭,自缢而死。死后由国史馆立传,载于阵亡大臣第一集,在开封府和本邑建有忠义祠。

十一世祖日敬公官至礼部尚书(相当于现在的部长),原配王氏和继配彭氏都是一品太夫人。

十四世祖庆藩公,即我爷爷的爷爷,殿试一甲二名及第,留在翰林

院任学士，后任山东监司大员，在当时也是显赫一时的新贵，但平时生活却非常简朴。在翰林院时，他和弟弟庆扬公二人还在外面教书，每月仅收学费花银二两，以补助在京城的生活。可见，先辈即使做了大官，位高权重，仍然两袖清风，清正廉洁如故。庆藩公的继配高阳李夫人，也是有名的大孝女，在家侍奉亲人，能够在无声无形中事先秉承亲人的心意，平日言行都严守礼节。庆藩公每天从外面回来，她都要出来迎接，帮助丈夫更换冠服，即使在寝室里也不随意言笑。庆藩公平时喜欢诙谐，也因她这样严肃感到拘束，不敢和她随便开玩笑。偶尔问起她来，她就说：“妇人不敬，莫大于褻，小行不谨，大德必亏。”听了她的话，不得不使人肃然起敬。可惜结婚一百天就去世了。庆藩公亲自为她写了一副挽联：“惟尔孝思知我意，怜伊宾敬益余哀”。

十五世祖兢公名下有九个儿子，其中一个就是我祖父。

我祖父祝惠望，又名祝鹤年，清末来四川做官，历任巫山、荣经、丰都等县知县，客居成都，有七个儿子。最小的儿子祝宗晓，又名祝永龄，字季与，就是我的父亲。由于我祖父英年早逝，父亲年幼，对祖父的生平知道得很少。有一天，父亲在外做客，偶然遇见一位老翁。当他听说父亲姓祝时，便问父亲：“过去巫山县知县祝鹤年是否和你是一家？”父亲说：“是我先父。”老翁立刻肃然起敬地拉住父亲的手说：“清官有后矣。”于是，滔滔不绝地谈起我祖父的许多德政来，赞不绝口。

我从来没有见过爷爷奶奶，只听说父亲还小，爷爷就去世了，是奶奶将父亲抚养成人，教他发奋读书。奶奶说：“不读书的人，就像地上的萤火虫，飞不高也不够亮；好好读书，就会像天上的星星和月亮，飞得又高又亮。”尽管当时家境比较困难，父亲还是读了私塾又读师范，还自学了英语，十八岁就考上邮局做事。我从来不知道父亲还有六个哥哥，更不知道爷爷是怎样死的。为什么那位老翁得知父亲是爷爷的



儿子时,意味深长地发出了“清官有后矣”的感叹?既然他知道爷爷是个清官,难道不知道他有几个儿子?怎么会对清官有后感到惊奇和庆幸呢?

我曾经想到,1971年“文革”时我被整得死去活来,全家都陷入了绝望的深渊。我上昆明看病,偶然听见新妈似乎自言自语地叹息:“你爷爷被清政府杀害,你父亲又被冤枉而死,现在你又挨整……唉,也许这是你祝家三代的命啊!”当时我感到很惊奇,为什么从来没有人提过爷爷的事,可能是我听错了吧。我真后悔一直没有问个明白。直到“文革”后期,我被解脱出来,教了几年历史,偶然查到,清末1901年到1905年全国各地先后爆发了一百四十多起反帝、反清斗争。川东农民提出了“灭清、剿洋”等口号,全川三十多县响应,声势极大。清政府大力镇压,地方官镇压不力,也要革职查办,甚至处死。我爷爷当时就在当地做官,难道我爷爷的死与此有关?我不敢肯定。我想,只有到巫山等地查一查历史档案,也许可能弄清事实真相。

由此可见,按出生,我父亲的籍贯是成都,我的籍贯是重庆,我们的祖籍是河南固始,原籍就应该是宁波了。从始祖到家父已是十七代,世世代代都是以耕读为主,以忠孝为本,清正廉洁,知书达理,品德高尚,即使做了大官,也是两袖清风,富厚之家实在很少。后来虽然每况愈下,各家仅免于饥寒,然而作奸犯科的也很少,累世清白的家风一直流传到现在。正如河南固始城内西大街祝氏宗祠正殿楹联上写的:“大节仰前贤曰忠曰孝,良谋治后嗣恒士恒农”。

现在,许多人对自家的家史一无所知,特别是有些年轻人,连自己祖辈的情况都不清楚,实在令人悲哀。更有人故意编造历史,欺世盗名,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,实在令人不齿。其实,历史是由家史组成的,社会风气是由家风组成的。但愿我祝氏子孙,勿忘家史,发扬家风,重振家业,重塑辉煌。

二 我的父母

我的父亲祝永龄，字季与。按照字辈应该是“宗”字辈，家谱世系表上他和六个兄弟也都是按宗字辈取名，他是最小的一个，取名祝宗晓，后来为什么改名祝永龄，是否与祖父之死有关，不得而知。我是抗日战争时期见到新修家谱世系才知道我家支系字派有两种，一种是“孝友传家，诗书继泽”，另一种是“日元之裔，广毓宗良，学尊孔孟，世守书香”。父亲是“宗”字辈，我是“良”字辈。

父亲1899年农历二月二十六日生。祖父由河南来四川做官，客居成都，父亲的出生地应该是成都。五姑妈和幺姑妈是父亲的姐姐，五姑父姓韩，幺姑父姓汪。我还记得两岁时，从重庆坐滑竿去成都，就住在五姑妈家。父亲出生以后，一直由我祖母抚养，其中艰辛可想而知，但再难也要供他读书。父亲很聪明，也很用功，从私塾到师范，成绩优秀，十八九岁就考上了邮政局，小小年纪就开始工作，养家糊口。

当时，中国邮政、海关和铁路都是由帝国主义控制并按他们的办法进行管理。邮局职员分为邮务生、邮务佐、邮务员和邮务长等职称，每年通过考试、考核、逐级晋升。除了业务以外，还要考英语。职务方面又分为科员、科长、股长、处长、帮办和局长等。中国人最高只能当帮办。一个省管理局只有两个帮办，一个邮务帮办，一个财务帮办，也就是两个副局长。局长只能由外国人担任，直到抗日战争以后才有中国人当局长。

父亲在邮局工作了三十多年，从邮务员做到邮务长，曾任东川、陕西、云南省邮政管理局邮务帮办、局长等，并兼任全国邮政工会负责人。

父亲长得一表人才，相貌堂堂，天生一副贵人相，而且洋气十足，

非常讲究穿着打扮。有一次去见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,穿西装、打领带、梳头发、照镜子,母亲给他收拾了半天,他才算满意。临走时母亲对他开玩笑说:“小心被孔二小姐看上哦!”父亲既聪明又能干,古文造诣很深,加上英语说得很好,所以在邮局提升得较快,但他却更关心邮政工人的利益,被选为全国邮政工会的理事。抗日战争时期,他和朱学范一起在重庆搞工人运动,朱搞全国劳动协会,父亲搞邮政工会,两人同在一栋楼里办公,来往甚密。当时,重庆是陪都,既要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,又要应付当局的各种压力,工作十分辛苦。



我的父亲

抗战胜利以后,朱去了上海。1947年我在北大读书,暑假里去上海,父亲在西安特别写信叫我去看望他。我在上海市邮政管理局楼上一间大办公室里见到他,向他问好,并汇报了我北大学习的情况。他鼓励我好好学习,并表示欢迎父亲去上海找他。后来父亲调往云南,1949年曾去上海找他。据说,他曾约父亲同去北平,为新中国工作。父亲因云南几万邮政职工等他到南京总局要钱回去发工资,所以不能和他同去北平。结果,正如大家知道的,新中国成立后,朱是民革成员,当了邮电部部长,后来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。而父亲虽未去北平,但不愿跟蒋介石去台湾任台北市邮政局长,而留在云南跟卢汉起义。邮电合并后,任云南省邮电管理局邮政科长,1951年3月,却被打成了反革命,惨遭不幸,

株连全家，直到三十三年以后才得到平反。

我家无田无地无产业，祖父虽然历任川东几个县的地方官，但两袖清风，一身正气，英年早逝，没有留下任何遗产。幸好父亲考上邮局，待遇不错，每月几十块大洋，足够一家人生活，后来还在成都盖了一院住宅。

我还记得小时候去成都，曾去看过那个新房子，五颜六色的玻璃门窗，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不过当时还未竣工，我们就回重庆去了，至今没有在这院房里住过。听说，后来被四姨妈偷偷将房子卖了，所以，我家连房产也没有。

父亲做到帮办以后，每月工资几百元大洋，邮局还提供汽车、洋房使用，生活比较宽裕。可见，我家既不是工人、农民，也不是地主、富农，更不是官僚资产阶级。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和划分阶级的规定，我家并不是靠剥削生活，而是靠劳动，靠工资生活；邮政局也不是党政机关，而是事业单位，邮政局长也不是党政官员，而是事业单位的高级职员。解放后把我家说成是什么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等等，不知从何而来。但是，我们一家却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

我的母亲白玉辉，1903年农历七月七日生，端庄淑惠，忠厚仁慈，勤劳朴素，当过小学教师，1923年与父亲结婚。我见过两张他们的结婚照片，一张两人穿的是中式礼服，父亲长袍马褂，母亲大袖旗袍；另一张两人穿的是西式礼服，父亲西装革履，母亲西式裙装，是典型半封建、半殖民地人家的写照。这两张照片“文革”时被母亲偷偷烧掉，实在太可惜了。

母亲生有一男四女，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。大女儿祝若芝，我是老二，家中独子，二女儿祝若蕙，三女儿祝若兰，四女儿祝碧华七岁时患脑膜炎不治早逝。母亲的一生都是为我们几个儿女而活着，为我们高兴，为我们骄傲，为我们伤心，为我们难过。特别是父亲遇害以后，



大姐、妹妹若蕙在重庆教书，我在嵩明法院当法官，母亲一直在昆明和妹妹若兰一起生活。我们几个儿女就是她默默地忍受着各种屈辱和巨大悲痛，坚强不屈地活下去的唯一理由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母亲从来没有打骂过我们，甚至从来没有大声斥责过任何人。解放前，家里有厨师、



我的母亲

保姆和车夫，母亲主持家务，对他们也非常客气，大家都很喜欢她。解放后，家里没有佣人，一切繁重的家务劳动，全由母亲一人承担，从无半点怨言。困难时期，她总是争着吃剩菜剩饭和杂粮，把好菜好饭和细粮留给家人吃。

文化大革命期间，她被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大风暴吓蒙了。她的三个女儿、女婿和一个儿子都受到了冲击和迫害，连她自己也被说成是“地主婆”、“反革命分子家属”，大字报贴在门上，红卫兵到处打砸抢抄抓。她提心吊胆地躲在家里将那些未被没收的名人字画、照片，通通烧掉，其中有于右任等题的字，也有徐悲鸿画的马。那是抗日战争初期徐悲鸿由重庆去成都，买不到车票，请父亲帮助，乘邮车去成都时，画了一幅奔马送给父亲，上面题的是“生平怀健足，几乎行不得，幸得季与先生一助”几个字，落款是徐悲鸿签名用印。现在想起来既可惜又可悲，这哪里是文化大革命，而是文化大破坏。母亲每天将户口簿、粮票、针线包

装在身上，忐忑不安地坐在家里，等红卫兵来抄家批斗，准备将她强制遣送到农村去。不久，大姐家一个儿子被武斗流弹打死，妹妹若蕙家一个儿子病死在上山下乡、缺医少药的农村，我也成了“牛鬼蛇神”。一直坚强不屈的母亲，终于因精神崩溃而病倒了。1976年1月8日，周总理逝世那天，母亲也永远离开了我们，享年七十三岁。她要是知道，现在父亲已经平反，我已调回昆明，当了大学教授，她的两个孙子都已成家，而且有了可爱的曾孙男、曾孙女，她的三个女儿都生活得很幸福，该有多好。可惜她解放后吃尽了苦，却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。

我还有一个母亲叫袁璞卿，我们叫她“新妈”。1911年农历十二月八日生，四川成都人。年轻时长得十分漂亮，聪明过人，读了许多古书，能背不少诗词，还跟父亲学英语。父亲非常喜欢她，1930年在成都嫁到我家当姨太太。母亲虽然有些不高兴，但也不好反对。当时，大户人家娶妻纳妾是很平常的事，祖上也有一夫多妻的先例，为了家庭幸福，大家以诚相待，团结和睦相处，加上父亲尽量做到不偏不倚，平等对待，日子久了，也就相安无事。新妈名下一直没有儿女，丝毫不能动摇我生母的地位，所以她对我们也很好。

父亲惨遭不幸以后，全家顿时陷入困境，一家人反而更加团结，相依为命，共渡难关。这时，大姐、妹妹若蕙远在重庆教书，我在嵩明当法官，若兰妹妹还在读高中，母亲只好到街上去做鸡蛋粑粑卖，好心的朋友见了，无不悄然泪下。新妈不顾抛头露面，毅然决定一个人下海经商，跑到乡下去收购土特产，十个鸡蛋赚几分钱，成了一名行商。1956年公私合营，她被分在市药材公司工作，一个人要背四五十斤的药材进出仓库，五十多岁才调到门市部抓药。

她一人住在东寺街一间不足十平米的黑房子里，退休后靠微薄的退休金过日子。她无儿无女，生怕日后年老体弱多病时无人照顾，多亏母亲经常抽空去看她。母亲病逝以后，新妈成了我们唯一的亲人，



我们大家都关心她,兄妹二人,轮流将她接到家里赡养,为她养老送终。1994年3月5日因病不治去世,享年八十三岁。经过我们商量,将她和父亲母亲一起合葬在跑马山墓地,每年清明大家都去上坟祭拜。

三 童年往事

1927年农历八月十三日我出生于重庆市,具体在什么地方,我也不知道。按照家族字派,我应是“良”字辈,本应取名祝良×,但当时还不知道有这个字派,才会取名“万安”。听说父母宦游万县时,城里有座万安桥,由此得名,以后一直未改。不过,这个名字虽然没有什么显赫富贵、豪迈闻达之意,倒也说明我这个人一生之中,有惊无险,万事平安。

儿时最早的记忆是三岁时曾随父母去过成都,在五姑父的大宅门里跑来跑去,后来爬到床上学卓别林跳舞,结果光屁股跳出一条蛔虫来,引得众人哄堂大笑。五六岁时在重庆夫子池附近上幼稚园,七岁时在重庆市私立依仁小学读书。

我家因为祖上没有留下田地房屋等产业,居无定所,最早住在哪里已经记不清了,只是依稀记得幼时曾在重庆市戴家巷住过,那时外婆还在,和我们住在一起。后来我上小学,我家就住在市中心大阳沟鄢家公馆里边的一个小院儿里,就在现在的解放碑附近。房主人姓彭,住在前面大院,后面有两个小院儿,单门独户,互不干扰。我家住在西边小院,院内有两层楼房,楼下为堂屋,中式家具,还有一个长长的神龛,上有天地国亲师和祖宗牌位。这就是吃饭会客的地方,两边是姐妹们的卧室,前面有个小天井,后面是厨房和佣人住房。厨房后面有个小巷,一直通往后门。巷里住着一个姓黄的跛脚老人,靠宰杀青蛙和鳝鱼为生。小时从后门小巷经过,经常会碰上被剥了皮还不死